



世纪前沿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4,
Globalizations, 1945-2011**

[英] 迈克尔·曼 著

Michael Mann

郭忠华 徐法寅 蒋文芳 译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
全球化 (1945—2011)

下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

全球化

(1945—2011)

下

[英] 迈克尔·曼 著 郭忠华 徐法寅 蒋文芳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4卷, 全球化, 1945~2011/
(英)曼(Mann, M.)著; 郭忠华等译.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5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前沿)

书名原文: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ume
4): Globalizations, 1945-2011

ISBN 978-7-208-13434-8

I. ①社… II. ①曼… ②郭… III. ①权力-研究
IV. ①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0773 号

责任编辑 徐晓明

封面装帧 陆智昌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四卷)

——全球化(1945—2011)

[英]迈克尔·曼 著

郭忠华 徐法寅 蒋文芳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1/16

印 张 38.75

插 页 8

字 数 523,000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434-8 / D · 2767

(上下册)定价 90.00 元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四卷)

全球化

(1945—2011)

下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社会权力的来源

下

目录

第九章 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311

第十章 21 世纪转折时期的美帝国/337

第十一章 全球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405

第十二章 全球危机：气候变化/452

第十三章 总结/501

参考文献/542

第九章

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

我已经将革命定义为推翻某种统治体制，并在实质上改变四种社会权力来源中的三种的大众反叛运动。这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是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政治革命是仅仅改变政治权力关系的革命，比如中国的1911年革命，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在第三卷里，我对20世纪主要的革命给出了更为充分的解释，无论这些革命是成功抑或不成功的；在这一卷的第五章，我又增加了二战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革命事件。第七章描述了苏联失败过程中自上而下的革命。稍后，在这一章里，我会花一些时间来讨论1979年的伊朗革命。其他各章讨论了这个世纪所发生的主要的改革过程，这些改革是革命的替代性方案。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些比较性和历史性的理论概括，并进而形成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虽然历史总会对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提出新的挑战。这些理论概括包含了所有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

首先，直到1979年的伊朗革命，20世纪的革命都吸纳了关于阶级剥削、斗争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它们在开始的时候不都是这样做的，但马克思主义确实是他们手中的灵活的意识形态工具。对现代革命而言，一个实质的意识形态权力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意识形态会提供一个历史发展观点，这种观点将能够团结意识形态权力精英，激励他们在反叛中采取冒险性行动，并在取得政权后进行彻底的社会转型。也就是说，即使在进行实际的改革时，革命者依然能够坚持他们最终的改革目标，中国共产党显然是这么做的。这也保证，获得政治权力并

不是革命的目的，这些革命者没有停下来享受权力，而是在意识形态的驱使下谋求改变其他的权力来源。

第二，对于大量的工人和农民而言，阶级剥削的观念所具有的合理性说明阶级斗争是现代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但是，我没有发现什么证据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农村中某种特殊的生产关系——自耕农、雇用劳动者和其他——对革命会有特别的帮助或者危害。这是一个广泛的阶级观念，这个观念常常关注促使革命发生的国家和上层阶级。革命精英必须迅速地解释他们在革命中的角色，因为他们大部分不是工人，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革命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因此他们必须将马克思关于工业阶级冲突的理论扩展到农民中去，但是他们必须迅速这样做，因为他们的存活需要这样做！阶级斗争是经济权力关系对革命所做的主要贡献。这意味着，意识形态精英所领导的政党具有大众支持；在中国，总是如此，在俄罗斯，关键时刻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支持，所有革命都会失败，即使面对微弱的和分裂的政府和军队，也是如此。

第三，列宁自己是这么评价的，很多人也如此重复：统治体制内的政治薄弱环节和分裂是革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这里，我稍微改变一下传统的观点，我是这样说的：那些压迫的、排外的或者基础薄弱、内部分裂的国家在面对革命时是最为脆弱的国家。这是在引发革命时政治权力关系的主要角色。我稍后会看到，与之前相比，革命者还必须把其关于剥削和革命的理论从经济领域更多地扩展到政治领域中，所以，民主对于革命来说很少是脆弱的。他们通常可以通过制度化的选举过程来处理社会不满。在魏玛共和国衰落之前，这种制度经过了一系列的危机和十多年的时间才变得非常紧张。

第四，除拉丁美洲的革命之外(大多数是不成功的)，在大战时期的革命中，大战中的战败加速了革命的发生，这正是斯考切波的革命模型所说的。但是，战争继续决定革命本身的形式。革命者和反革命都是

军事化的，并伴随着内战。在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和尼加拉瓜都是如此——在今天的尼泊尔也是如此。这是军事权力关系所发挥的主要作用。

因此，四种社会权力的来源都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且由于四种条件都是必要的，因此很难说哪一个更加主要。当然，其中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可以替代另一个次要的因素。因此，中国的国民党政权并不是特别的软弱，它比反对它的共产主义苏维埃更加强大，但它比破坏其权力的日本政府更加软弱，并最终为共产主义政权所取代。拉丁美洲的一些革命或革命努力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它们的政府具有更高的个人化和排他性。我们将会看到，伊朗革命也是在无战争的情况下发生的，因为伊朗国王的极端个人化特征和微弱的基础结构替代了战争的作用。

这些是总体上的共同因素，但并不是所有的革命都相同。我们可以区分出历史上的两次革命浪潮(也可能成为三次)。第一次革命浪潮发生在1917—1923年之间。这次革命浪潮以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作为开端，并扩展到东欧和中欧地区失败的革命。如我在第三卷第六章所指出的那样，布尔什维克革命仍然是唯一一次在工业社会发生的成功的革命。与马克思所预测的一样，这次革命的主要参与者是组织化的无产阶级，即工业劳动阶级。1917年初，布尔什维克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力量。其后，他们的影响迅速增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赶上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工人需要农民战士的武力支持，占有土地的农民则在农村废除了政府权力，工人阶级实际上还需要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在革命及其后的内战中，工人阶级一直是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是，在其他工业国家里——以及现在仍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没有进行革命，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工人阶级在改革资本主义和深化民主改革中仍然是主要力量(虽然不是唯一的力量)，其结果不是革命，而是T.H.马歇尔(T.H.Marshall)所说的社会公民权。那么，为什么只有布尔什维克和俄罗斯工人阶级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呢？

基本答案非常简单：战争。一战引起了国家基础权力的崩溃以及后来其统治合法性的丧失。但是，俄罗斯是唯一一个具有强大工业部门的国家(工业部门在其两个首都城市里尤其重要)，基于工业部门的发展，为了弥补武器和后勤上的不足，步兵军团被用作炮灰，大战给他们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军事失利，这些失利导致战争过程中发生一次重大的士兵反抗。这些士兵原来大部分都是农民，虽然工人在海军中的比例很高。在反抗中，他们用武力支持罢工的工人、要求面包的示威者和占据土地的农民。一个更为政治化和军事化的剥削概念能够解释所有这些群体。只有工人把资本家当成主要的敌人，但是所有的反抗者都将国家视为剥削者，当国家在徒劳无益的战争中牺牲成千上万条生命的时候尤其如此。当时，布尔什维克是唯一一个在广义上讨论剥削的政党。他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土地、民生与和平的方案，因为他们的方案可以结束产生剥削的主要来源，所以人们会追随他们。当托洛茨基宣称“当没有其他路可走，革命才会发生”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君主统治和自由主义方案都失败了。需要注意的是，军队不仅仅拒绝对革命进行镇压：他们是革命的突击部队，而且他们将工人和农民联系起来了。但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军队则都帮助镇压革命。

托洛茨基后来用“综合和不平等发展”对革命进行经济学分析。他认为，在当时的俄罗斯，封建主义的矛盾(主要影响农民)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主要影响工人)同时爆发。这个分析是准确的，但是，如果这是唯一的原因，这会产生独立的反抗，这些反抗也会被成功地分别镇压，当时的西班牙就是这样。布尔什维克的成功还依赖于战争。在俄罗斯，两个主要的因果关系非常重要：第一个因果关系涉及工业工人阶级发起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组织；在第二个因果关系中，大战中持续的失利削弱了统治政权、武装了革命，并使军队将工人和农民结合起来。这两个因果关系共同导致革命的成功。

第三卷的第六章对1918—1923年之间发生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和意大利的不成功革命进行过分析，它强化了这一结论。战败也削弱了现存政权(损失惨重的意大利军队只是在形式上取得了胜利)。这些国家和俄罗斯在战争经历上各有不同，战败的军队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反抗。与工人委员会一起，士兵委员会迅速被建立起来，在某些国家里，这两种委员会都要求革命。但是战后新的中央政权有其解决的措施：它们解散军队，并让其上缴武器之后回家。军队不复存在了，革命的核心士兵只能面对由军官所领导的、更为有效、更加组织化和半军事化的反革命力量。这意味着军人不能将工人和农民结合起来。这是这些国家的一个主要弱点，因为在战后的暴乱中，大部分农民都不积极。这些国家与俄罗斯还存在其他的不同。在德国和奥地利，工人逃避左派革命者，因为他们可以从战后的共和国那里获得利益。在匈牙利，革命者已经在首都取得了政权，但是罗马尼亚的反革命军队介入并镇压了革命政权——这是一战后唯一一次国外反革命力量发挥主要作用的事件。

布尔什维克很轻易就夺取了政权，而且首都也没有迅速的反革命镇压。但是，保守主义者在很多省份重组并组建了白色的准军事组织，这也迫使布尔什维克发动红军来镇压他们。接下来长达数年的内战极具破坏性，尤其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资源。但是，在西方盟国停止对白色政权进行援助之后，它们对平民的残暴以及内部的分裂导致了红色政权的胜利。从那以后，国内便再也没有出现有力的反革命运动，除非是在斯大林的心里。布尔什维克利用反革命威胁对他们日益独裁的权力进行合法化，但是，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则是要将他们的乌托邦目标强加给不情愿的民众。当然，苏联确实遇到了来自国外权力的反革命威胁，尤其是当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之后。建立苏联的防御力量意味着优先加速工业化进程，这意味着要将农业剩余产品转移到工业投资中去，这就要求强迫那些不情愿的农民。因此，俄罗斯革命增强了国家的独裁权力，而且其权力比沙皇的权力更加有效。这是以下集中因素的结合：布尔什维克的权力和转型目标，尤其是斯大林对抗地缘政治压力和

不情愿农民的国家权力。

斯考切波发现，革命会增强政府的官僚统治(Skocpol, 1979)。但是，对法国大革命而言，这是不正确的(如我在第二卷所说的那样)。但这对俄罗斯革命来说是正确的，因为党国体制实现了这一点。国家基础权力不仅依赖于政府行政机构的增强，而且依赖于政党提供安全服务以及监察国家官员和普通大众。政党不是像韦伯所说的作为达到目标的理性手段的官僚体制，而是致力于其终极价值的意识形态工具。此外，它发动大众动员的英雄计划的趋势根本就是科层体制。但是，公民心理上脱离政府(并最终脱离政党)暴露了国家权力的局限性。但是，革命却增强了国家的独裁权力和基础权力——总体而言，这不是什么好事情。

第二次革命浪潮受中国共产党的鼓舞。中国革命也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与之后的革命一样，它是在农民的名义下进行的，而不是在工人的名义下进行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一个关于农村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富有的农民和地主剥削贫下中农的劳动、租金、税收和其他费用。农民大众能够理解这种剥削。这对共产党的成功至关重要，因为农民大众意识到，他们可以从共产党那里得到比国民党或日本人那里更多的物质帮助。像布尔什维克革命一样，这个革命是由团结的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阶级革命。但是，由于他们担心有产阶级和国家的权力(以及后来日本人的权力)，农民的努力几乎没有超出那种地方性的、例行化的、为有限目标的示威反抗，由于他们相信共产党也会将政府压迫强加到他们头上，所以他们也不欢迎共产党进入他们的村落。

因此，革命的第二个要求是共产党必须为他们治下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农民提供军事保护。从1931年在江西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到1949年取得最终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一个军队，它的政策也一直包括为根据地建立进行自我防御的民兵组织，从而土地、地租和税收分配改革可以在他们内部进行。更重要的军事条件是1931的日本侵略，这

次侵略是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一直持续到1945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力量被迫从消灭共产党转移到对日战争上。他不能够打败日本人，这削弱了他的政权。因此，共产党可以保护并逐渐扩展其根据地，并可以在日本投降后对抗国民党。

我们又发现了总体上相似的原因：首先，阶级斗争和毛泽东的农村意识形态；其次，中国一系列的战败，使得团结的、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共产党能够建立军事防御力量，这一军事力量是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赢得农民信任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在第二次革命浪潮中，几乎所有1949年之后的革命都是以农民的名义进行的，而且大部分都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虽然也都受到了苏联的物质帮助。但是，中国与苏联不同。拉丁美洲之外的革命也是反殖民主义革命，而且这些革命混合了农民阶级斗争和反殖民主义民族运动。尤其是在亚洲，农民认识到两个相互联系的敌人：殖民地国家及其主要的走狗，这些走狗主要是当地的地主和商人。二战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些敌人，在二战中，首先是日本推翻英国、法国和荷兰的亚洲殖民地，其后是美国、英国和中国击败日本帝国。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地方，在当地人看来，二战甚至削弱了英帝国。战争失利的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则遭受更大的创伤。此时，在世界殖民地国家里，民族主义运动取得了独立，它们大部分是通过纯粹的政治革命进行的，有些则是通过阶级斗争与反殖民主义民族运动相结合的社会革命进行的。在亚洲，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革命运动都综合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革命也更多地是社会革命。但是，与其他非洲反殖民主义政治革命一样，在安哥拉革命精英的眼中，民族国家只是一闪而过。与具有长期政治历史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不同，那里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民族认同感。在非洲，更多地是种族问题——驱逐白人——在穆斯林国家，种族问题与宗教问题——驱逐基督教——相结合。虽然我不赞同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农民民族主义解释，但是他的理论

更加接近这些事件的实际，因为这些革命都是在反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第二次革命浪潮有三个主要原因：农村阶级斗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以及大战中统治政权的失败。需要注意的是，在世界大战中获胜的英国只遭受政治革命，并成功地镇压了马来亚和肯尼亚的武装起义。宏观经济条件和具体的生产关系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作用并不大。接受共产主义的农民，有时候是佃农、有时候是小业主、有时候则是无地的劳工。像古德温反驳佩奇(Paige)和沃尔夫(Wolf)的经济观点时所说的那样，这些运动具有不同的社会基础(Goodwin, 2001: 82—84)。最重要的是，农民与地主之间进行的地方性的、农村的军事斗争，与战争所削弱的殖民统治混杂在一起。

因此，在夺得政权之后，成功的革命通常不会遭遇到国内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在中国、朝鲜和越南都是如此，在这些地方，革命政权开始都比国内反对派更受民众欢迎。但是，这些革命者必须与新地缘政治带来的、更强大的反革命力量相抗争。其核心问题是，美国下定决心不再失去更多的“中国”，并用一些必要的力量来打败共产主义革命。美国为受到威胁的政权提供了数以亿计美元的援助，如果有需求，它随时准备使用焦土政策进行军事干预，为最大程度地削弱共产主义政权和让它在邻邦民族主义者那里没有吸引力，美国不惜杀害更多的人和破坏更多的经济。最初，通过向朝鲜和越南的革命者提供支持，苏联、中国与美国进行抗争，但是，他们在美国之前就厌烦了他们在当地无法控制的盟友。相反，俄罗斯革命在一战结束的时候很大程度就被弃置不顾，尽管在内战期间西方对它进行过短暂的、半途而废的干预。与第二次革命浪潮中的革命不同，俄罗斯革命没有外在的支持，中欧和东欧的革命也没有。也许有人会说，1918年以后西方大国干预的无力是源于战争的疲劳，但是，二战之后，美国、苏联和中国也都经历过战争的疲劳，它们还是进行了更多的干预。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曾经支持中国国民党，但内战开始以后，它却很大程度上躲开了。

但是，这次失利的结果是，美国的反革命策略得到增强，同时美国降低革命预期的能力也得到增强。

美国的策略似乎不太成功：从朝鲜撤退、在越南失败、老挝和柬埔寨的结果也不好。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在朝鲜，美国对北方的轰炸保护了南方政权，并且在半岛南部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最终民主化的政权。但是，内战中北方的毁坏和军事化也使得共产主义政权在南方和境外不受欢迎。在越南，轰炸削弱了共产主义体制，尽管它后来又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复苏了。在柬埔寨，美国的轰炸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共产主义政权——红色高棉，而且，其邻居越南的共产主义政权还侵入柬埔寨以推翻它。在老挝，美国(和越南)的干预导致内战和极其微弱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个政权不能有效地管理这个国家。所以，美国的反革命策略事实上在两个层次上获得成功。在较高的层次上，它催生民主的资本主义政权，这虽然很少发生。在较低层次上，它催生焦土，破坏整个国家，这构成了让各阶级民众放弃革命的刺激，而且也让邻国民众不再步其后尘。美国在后一种策略上的政策更加成功，这种策略构成革命的主要障碍，尤其是在小国家里，否则这些小国家会轻易地被破坏。

在强调阶级斗争上，我的解释可以说是马克思学派的观点，但它在其他方面又不是马克思学派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趋势和生产过程的微观关系对革命结果的影响都不是很大。革命没有在经济周期的某些特定时间点上发生，也不是通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发生的。参加革命的工人有时候是技术工人，有时候是非技术工人；农民有时候是佃农，有时候是小业主，有时候是无地劳工。这些运动有不同的社会基础，虽然积极分子中男人多于女人，大部分冒险者是年轻、单身的成年人。但是，在这些革命中，大众阶级有着共同的被剥削感，而这种感觉又不仅仅是在劳资关系中产生的，因为它也包括了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上(在殖民地的革命中还有种族上)的被剥削感。它们之间的结合使得灵活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者能够合理地、正确地找

出剥削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但革命之后，他们立即变得不那么灵活。度过蜜月期之后，他们对假想的反革命阶级和政治反对者进行残酷的镇压。国家精英的独裁权力以与苏联相同的方式和原因增加。乌托邦目标、地缘政治压力以及农民不情愿地为工业和军事做出牺牲，共同加强了独裁权力。党国不断发起英雄计划的基础权力也增强了，而且与苏联相比，民众心理上对政府的脱离更少。但是，其后中国政府引进了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经济模式，越南后来也进行仿效，这种灵活性使得政府可以兼用市场和国家两种经济工具，这种结合也使得这个国家取得巨大的经济增长，而且经济增长仍在继续。到目前为止，这是20世纪一条最好的革命发展路线，虽然改革还没有深入地扩张到政治领域。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现代革命都可以和苏联或者中国革命一起进行解释。非洲就有些不同，虽然那里的反殖民主义反抗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鼓舞。在世界大战期间，非洲人被鼓动杀害欧洲人，这也削弱了欧洲人的优越性。拉丁美洲则更为不同，因为这个大陆上没有发生过大战。但是，这里具有民族和种族特权引起的极端不平等和长期的农民起义传统。也许，最重要的因素是这里微弱的、个人化的和排斥性的统治政权。这些因素导致多次革命的努力，但只有在古巴和尼加拉瓜的两次革命获得成功，此外还有1960年代中期和1970年代中期被镇压下去的一系列革命游击运动。这里的革命也有一些反殖民主义的成分，因为统治精英通常受到美帝国的支持，而且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理论。比如，卡斯特罗和格拉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这些都对源自扎帕塔(Zapata)和桑迪诺(Sandino)的拉丁革命传统进行重新定位。但是，一般说来，如果能够从美国得到一些外来支持，这些地方政权应该可以对抗革命运动。那两次成功革命的对象是典型高压统治的、排他性的、基础薄弱的和个人化的国家政权，社会学家都认为这样的政权面对革命将极其虚弱。它们甚至脱离了某些精英群体，拒绝安抚民众的不